

师道师说——全景展示大师的学术生活史

师道师说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季羨林

卷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编◎王守常

选编◎王邦维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中國文化書院九秩導師文集

季羨林

卷

名譽主編◎湯一介 主編◎王守常

選編◎王邦維



人民東方出版傳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道师说. 季羨林卷 / 季羨林 著; 王邦维 编.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1
(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
ISBN 978-7-5060-5979-4

I. ①师… II. ①季… ②王… III. ①季羨林 (1911~2009) —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0473 号

师道师说: 季羨林卷

(SHIDAO SHISHUO: JI XIANLIN JUAN)

作 者: 季羨林

编 者: 王邦维

责任编辑: 栗河冰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5979-4

定 价: 45.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湯一介敬題

壬辰年冬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题词：

北宋张载“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文化书院简介

中国文化书院由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羨林、朱伯崑、汤一介、庞朴、李泽厚、乐黛云、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共同发起，以及杜维明、傅伟勋、陈鼓应等港台及海外著名学者共同创建，于1984年10月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中国做贡献。

《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文集》

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汤一介

主 编：王守常

副 主 编：李中华 魏常海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尧	王守常	方立天	乐黛云	宁 可
刘梦溪	汤一介	孙长江	杜维明	杨 辛
李中华	李学勤	李泽厚	吴良镛	余敦康
张立文	陈越光	林 娅	欧阳中石	庞 朴
侯仁之	谢 龙	戴 逸	魏常海	

组织编辑：中国文化书院

总序一

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于1984年，是一所在众多老一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先生的支持下，由一批中青年学者办起来的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到今年（2011）已经有二十七年的历史，一个纯民间的学术团体在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下来，而且对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多多少少出了点力，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自1949年后，民办的书院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也可以算是一件新事物。据我所知，如果说中国文化书院不能算1949年后第一个颇有影响的纯民间学术文化团体，大概也是最早办起来的少数几个中的一个了。自中国文化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众多的新办书院，并恢复了多所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书院。因此，说中国文化书院对民办书院起了个带头作用，大概也不为过吧！

我认为，对中国文化书院来说，也许最为宝贵的是，书院集合了一批有志发展和创新中国文化的老中青三代学者。老一代学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邓广铭、周一良、任继愈等，他们的学术风范，无疑是当时维系书院的精神力量。1984年底，文化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开会，当时我们没有院址，也没有什么经费。任继愈先生说：“草棚大学可以办，我们连草棚都没有也要办。”因此，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借青年干部学院场地举办了第一期“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梁漱溟先生自1953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当时梁先生已经88岁了。我们请他坐着讲，而梁先生一定要站着讲，他说这是一种规范。梁先生在演讲中高声地说：“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我一生都是拼命干。”这对在场二百多名听众是极大的鼓舞，也给了中国文化书院在风风雨雨艰难的环境中得以支持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一个希望在中国发生良好作用的学术团体，应该是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型群体。中国文化书院在走过的二十多年中虽然存在过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能容纳不同学术观点，无门户之见，有良好学术风气的团体。例如在中国文化书院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持激进批判态度的青年学者，也有被视为致力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还有努力寻求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中坚力量。这些在文化问题上具有不同认识的学者集合在一起，虽然对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考虑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抱有的一种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愿望则是一致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书院也和国内外的许多学术团体和非学术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队伍中不仅有众多的我国第一流学者，而且还聘请了一批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著名学者作为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刻要有一个观照全球的眼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开放性。根据这样的认识，中国文化书院一直在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有主体精神、更加开放、能容纳多元趋向的有朝气的学术团体。

回顾中国文化书院二十多年的历史，在它即将进入“而立”之年时，我们从2010年起开始筹备编辑出版一套已故去的和现仍在世的九十岁以上导师每人一册的“文集”。在这套“文集”中，收入他们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他们的子女、学生的纪念文章。这套“文集”不仅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怀念和尊敬，而且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文化走过的历程。

在我们编辑的过程中，江力同志出力颇多，东方出版社的同仁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

汤一介

2011年12月1日

总序二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用“三五之变”来讲天运变化，也可以用来比附二十世纪的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那一百年里，中国社会变迁经历了上下两个五十年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想的大变革。在第一个五十年的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经历了从“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阵痛，走向融合西方思想文化而从容探索建构中国式的思想文化范式的历程，造就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一批颇具哲学思想原创性的著作纷至展现，他们走出王国维的以西方哲学概念诠释中国哲学观念的困局。在历史考古学方面，以西方史学的理论充实了传统中国史学的纪传体叙事模式，以实证田野调查手段，让五千年古史鲜活起来。在文学领域，他们以人文主义融合了传统中国诗词歌赋的情感创造出新时代文学作品。在训诂考据文字学方面，他们用新的研究方法给这最具传统的领域增添绚丽色彩。总而言之，那三十年几乎在所有人文学科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成果。诚如梁启超所言：“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治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可以说今天的学人如不能承继这份学术遗产的话，是无法迈进中国学术研究的堂奥。

后五十年代始，中国社会发生了中国史上的巨变，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结束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史。其后三十年，曾经引导中国思想剧变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了由学理向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确切地说毛泽东思想笼罩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在全球冷战格局中的中国在理论学术界，“左”倾教条主义得以大肆横行，政治批判取代了严肃的学理研究，所有学术话语都转换成意识形态斗争的语言。从而造成学术理论思想创见的贫乏，学术研究的发展由繁荣走向枯

稿。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除在古籍史料整理上有值得称道的成绩以外，在学术理论、学术方法方面的发展则乏善可陈。待到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和思想学术研究放开，思想界也开始了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历史成因的文化反思，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再次如潮涌来，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译为中文，成为最时尚的读物，演为二十世纪的第二次“西学东渐”高潮。此后又有多年的思想学术的低潮，不过那寂寞春夏还是孕育了学术思想的种子，二十世纪最后十多年学术思想的成果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二十世纪去了，中国文化书院的一部分导师也随之仙逝。他们大多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近百年来他们用心血写就了二十世纪学术史上最恢宏的篇章，他们的心路历程是二十世纪的生活史中最让人心痛的一页。他们有过愉快，有过迷茫，有过痛苦，但他们矢志不渝地爱着中国。他们用心用笔将世界文化迎进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世界。

这套丛书选编了中国文化书院九十岁以上的导师的最具代表性著作和他们的亲友及学生对先生的追忆而集结成书。不为歌功颂德，只为记住我们自己的老师！当然我也企盼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土地上，也应有属于他们的一座纪念碑！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是为序。

后学王守常谨记

2011年12月22日深夜

目 录

总序一 1

总序二 3

印度与中亚古代语言

 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3

 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 > u 的现象 46

 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 58

 梅咀利耶与弥勒 84

印度文学与文化

 《梨俱吠陀》几首哲学赞歌新解 99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

 《列子》与佛典 111

 浮屠与佛 143

 再谈“浮屠”与“佛” 155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168

 论梵文ṭḍ的音译 176

 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 ṛ ṝ ṝ̄ 问题 215

 所谓中天音旨 248

 印度文学在中国 275

 《糖史》附录三篇 291

比较文学

关于东方语文学的研究	325
关于神韵	330
《关于神韵》一文的补遗	339

其他文字

《季羨林散文集》自序	343
年	348
老 猫	353
赋得永久的悔	362

总后记	367
-----------	-----

印度与中亚古代语言



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引 言

1956 年，我写过一篇《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58 年，我又写了一篇《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到现在已经有 20 多年了，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期间，我对国外研究这个问题的情况十分隔膜，因而没有能对这个问题继续探讨与钻研。只是在最近二三年内，我才又有可能了解外国的研究成果。原来在 1953 年美国学者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发表了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1954 年德国学者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发表了 *Beobachtungen über die Sprache des buddhistischen Urkanons: aus dem Nachlass herausgegeben von Ernst Waldschmidt*。出版以后，曾在海外激起了一阵讨论原始佛教语言的热潮^①。爱哲顿的那几册皇皇巨著，我是知道的。我的那一篇《再论》就是针对他的巨著而写的。其余情况则茫无所知。1954 年，德国东方学学者大会举办了一个讲坛讨论会，讨论了与此有关的问题。到了 1976 年，在联邦德国哥廷根（Göttingen）举行的“最古佛教传承的语言”（佛教研究座谈会 II），可以说是研究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一次大检阅，集中地表现了在这方面的最新成果。我怀着十分愉快、兴奋的心情反复地阅读了座谈会上的全部文章，一方面感觉到，这样一个冷门居然还有这样多的学者在钻，大有空谷足音之感；另一方面又感觉到，

^① Heinz Bechert, Allgemeine Bemerkungen zum Thema “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见 *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Göttingen 1980, p. 24.

会上某些文章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我不禁技痒起来，着手写这一篇《三论》。同前两论比起来，这篇《三论》涉及面要大得多，它涉及原始佛教经典的形成、佛教的传播、宗派的形成，以及对阿育王碑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不是我有意这样做，而是其势使然。

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有没有一个“原始佛典”？“原始佛典”使用什么语言？是否有个“翻译”问题？

二、释迦牟尼用什么语言说法？

三、阿育王碑是否能显示方言划分？

四、《毗尼母经》等经中讲的是诵读方法（音调），还是方言的不同？

五、我的看法。

现分论如下。

—

为了论证方便起见，我在这一节里着重阐述反对有一个“原始佛典”的学者们的意见。至于我自己的看法，留待最后一部分去谈。

有没有一个“原始佛典”？好像是1976年哥廷根座谈会的中心议题。参加会的大多数学者似乎都否认有这样一部经典，从而也就否认了使用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经典的论断。因此，我想先来探讨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道的，首先提出“原始佛典”这个概念的是吕德斯。他在一些文章中使用了这个名词；在我上面讲到的他死后出版的那一部著作中，他又集中地、系统地论述了“原始佛典”的语言特点。他首先使用的德文原文是 Urkanon 这个字，德国以外的学者也经常使用。总之，吕德斯是主张有一个“原始佛典”的。

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使用过 précanonique（前经典）这个

词儿。^①他把原始佛教经典称之为“前经典”，可见他不把它看作是经典。他根据早期佛教的一些术语，特别是律藏的一些术语，认为有一种“前经典语言”。我自己感觉到，这种“前经典语言”同吕德斯所说的“原始佛典”，有某些联系，不管烈维承认不承认有一个“原始佛典”。

贝歇特（H. Bechert）等一些参加 1976 年哥廷根座谈会的学者们，大部分不承认有一个“原始佛典”。他们的理由何在呢？在否认派之间观点也不尽相同，论证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归纳起来，其理由约略有以下数端：

- （一）语言问题与是否曾经有过一个 Urkanon 互相依存；
- （二）佛的语言政策如此决定；
- （三）佛典最初只是口头流传；
- （四）没有一部现存的佛典能反映佛本人的语言；
- （五）要使用新的研究方法；
- （六）不能使用“翻译”这个词儿。

我在下面分别按顺序加以讨论。

（一）什么叫做“语言问题与是否曾经有过一个 Urkanon 互相依存”呢？用贝歇特的话来说，就是“可靠地去确定最古佛教传承的语言形式（linguistic form）这件工作，不能够同确定它的书面形式（literary form）分开来”^②。他认为，最早的佛教传统的书面综合物（literary complex）的形成是一个逐渐进展的过程。“拼凑起来的佛典的本子很可能在比丘们还是沙门（śramaṇas?）时跟随长老四处云游的最早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三藏中所有的本子并不是同时编定成为经典的，专就巴利文经典而论，也并不都是同时传入锡兰的^③。先有一个个的个别的口头流传的教义传统，这些传统是地域性的。然后随着佛教的传播与推进，

① Observations sur une langue précanonique du Bouddhisme, JA. ser. 10, t. 20, 1912, p. 495 f. . Schawer 也用过 Precanon.

② Die Sprache der ältesten buddhistischen Überlieferung, Göttingen 1980, 第 13 页。

③ 同上，第 28 页。